

四库全书系列伤寒类医著集成

◎总顾问 钱超尘

总主编 张其成

四庫全書

伤寒类医著集成

◎主编 虞舜 王旭光 张玉才

第一册

伤寒论注释 附 伤寒明理论、伤寒论方

巢氏诸病源候总论·伤寒病诸候

备急千金要方·伤寒方

外台秘要方·伤寒门

伤寒微旨论

伤寒总病论

圣济总录纂要·伤寒门

类证普济本事方·伤寒时疫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四库全书系列伤寒类医著集成

◎总顾问 钱超尘

总主编 张其成

四库全书

伤寒类医著集成

第一册

◎主编 虞舜 王旭光 张玉才

◎副主编 王惟恒 孙建新 李艳 沈津湛

胡剑北 夏黎明 蒋宏杰

◎本册编纂人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建新 王旭光 王尚全 许霞

孙建新 李艳 汪新安 张玉才

张薛光 陈仁寿 畅洪昇 胡剑北

郜 峦 段晓华 钱超尘 虞舜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四库全书系列伤寒类医著集成》学术委员会

学术总顾问 钱超尘

学术委员会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庆国	王振国	王 键	方向东	许敬生	李宇航
李济仁	沙 涛	林 楠	张灿理	钱超尘	陶晓华
温长路	梁永宣	傅海燕	翟双庆		

《四库全书系列伤寒类医著集成》编纂委员会

总主编 张其成

副主编 王旭光 张玉才 胡剑北 虞 舜 臧守虎

编纂委员会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旭光	王维恒	孙建新	李 艳	杨金萍	邱 浩
沈津湛	宋咏梅	畅洪昇	张玉才	张其成	胡剑北
段晓华	蒋宏杰	夏黎明	虞 舜	臧守虎	

《四库全书伤寒类医著集成》编纂委员会

主 编 虞 舜 王旭光 张玉才

副主编 王惟恒 孙建新 李 艳 沈津湛 胡剑北 夏黎明 蒋宏杰

编纂委员会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万四妹	马建新	王旭光	王尚全	王 剑	王惟恒
许 霞	孙世发	孙建新	李 艳	杨亚平	杨奇云
邱 浩	汪文生	汪世忠	汪沪双	汪新安	沈津湛
张工或	张玉才	张薛光	陈仁寿	畅洪昇	赵 艳
胡剑北	郜 峦	段晓华	俞志高	夏黎明	钱超尘
蒋宏杰	虞 舜				

張仲景像



蘇州陳雪樓
序為作子松李



出自陈雪楼《中国历代名医图传》

文淵閣記

國家荷云為四庫全之暇則之各始家法則
 天庥承天地立書蓋以又恐欲於臆朝予所以
 佑命心為生古今幾速而或今則年繼價
 重熙累民立道千百年宇失之疎其靈而祖考覺
 洽同軌為往聖宙數萬畧魯魚內閣大世之
 同文所繼絕學里其間亥豕因學士之殷心化
 謂禮樂為萬世所有之是而生重殿閣育民物
 百年而開太平書羅夥播有之銜者尚返古之
 後興此胥於是都不出凡事豫存其名深意庶
 其時也手繫故四庫之則主書若以貯在是乎
 而禮樂乃下明目也乃之成羅書可為序在是
 之興必詔勅岳輪大臣尚需時名實意季潤云
 藉崇儒牧訪名併修司日而時相副而制一如
 重道以山披秘命翰林書之所文筆殿范氏天
 會其條簡并出使分枝則不可居下前一閱而
 實儒與天福之精替德不宿構乃歲時其詳則
 道匪文舊歲以居之勤官禁之經筵講見於海
 莫潮故及世家仍予十中不得學而必國文源
 予蒐四之獨弄年之暇甘地爰臨於以閣之記
 庫之書於是浩天不勤於文華枕經藉甲午孟
 非徒博如例海則玩日嚴後建史鏡已冬月中
 右文之秀若邱惕時有反洲閣橋民護辭
 名蓋如山而德所不允以待之世子孫師筆
 張子所名之曰文淵閣奉以為

王叔和像



出自陈雪楼《中国历代名医图传》

孫思邈



孫思邈，字大聖，京兆華原（今陝西耀縣）人。唐初著名醫學家，學識淵博，早年考中進士。隋文帝、唐太宗、唐高宗屢召不就。決心隱居，終生致力於醫學。先後寫成《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書，內容宏富，為後世醫家所推崇。他認為人命至重，貴於千金，一方濟之，德隨於此。重視婦、兒和小兒疾病，創製小兒疳積散、小兒驚風散等，為後世醫家所稱。他為華原人，人們稱他為華原王。

壬戌仲神醫

王叔和像



出自陈雪楼《中国历代名医图传》

四库全书系列伤寒类医著集成序一

《伤寒论》(《伤寒杂病论》)作为中医学的最重要的经典之一,近两千年来对中医学的影响,对中华民族的健康、繁衍和发展,乃至对亚洲、对人类所作出的贡献,在温长路先生的序中已经有了准确而精到的论述。关于《伤寒论》版本流传、演变以及研究的情况,钱超尘兄的序中有更为详尽的论列。这些都无需我在这里辞费。《伤寒论》既在人类医学发展史上有着如此重要的地位,现在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集中巨大的财力、众多的人力编辑出版了《四库全书系列伤寒类医著集成》,其意义自不待言。

《四库全书》功过参半。借由编纂而禁书、毁书、改书是其罪;但保留古籍、钩沉辑要又是其可称道处。特别是像搜集钞录《伤寒论》这类的书籍,因为没有触及当朝忌讳和有碍于以汉制汉的内容和言辞,因而其所写录的真实和准确是无可怀疑的,其价值也就应该给予肯定了。二百多年来世人无缘得睹《四库》面目,上个世纪,海峡两岸竞相影印,它才逐渐走进各地各校图书馆,得为学人使用。但卷帙浩大,购置、存储、检索仍为学者所苦,此次《四库全书系列伤寒类医著集成》的出版无疑将为研究伤寒学以及整个中医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这真是一项巨大的功德。

我的专业并不是中医学。和中医学以及中医界有了较密切的联系几乎是由于偶然的“机缘”。改革开放后,训诂学出现复兴之势,反观训诂学二百多年的历史,我认为训诂学欲真正复兴,必须走出围绕“经学”团团转的怪圈子,以训诂这一利器去观照传统文化的全部。几经呼吁,应者寥寥,于是自己“先行先试”,其中一项工作就是钻研《黄帝内经太素》,就杨上善注提出了看法。巧合的是,在此前后我国当代伤寒学大家刘渡舟先生所主持的国家古籍整理重点项目《伤寒论校注》毕役,蒙师弟钱超尘教授举荐,承刘老不弃,我参与了该项目的专家验收会议。为此,我事先反复通读了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虽未能得其精髓,却也知惊叹其六经辨证的伟大,勉强避免了入门不知所云的尴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现在以给这套“集成”作序相命,大概与此有关吧。其实,自那次幸得与刘渡老及国内众多伤寒大家共处一堂收益多多之后,二十年间再也没碰医学典籍,虽然时萌继续钻研的念头。我于《伤寒论》文本的“功底”就那么一点点,几近于无,何况于辨证论治更是百分之百的外行,怎可担“序”之重任!倒是近年来,出于对中华文化受到经济全球化挟裹着的“文化一体化”严重冲击的忧心,出于对中西文化比较重要性的认识,不由得又在心底燃起了对中医学的关注,于是中医经典又成了桌边必有之物。这次对中医学的学习和思考和二十几年前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完全从宏观的角度,从学术发展史、哲学史的视角出发了,自以为对中医学的认识又有所进步。于是这才壮着胆子接下这个任务,并借以抒发胸中郁积已久的一些想法,就正于方家。

在我对中医学的认识中,以下几点是自认为似乎很重要的:

1. 中医的形成和成长,贯穿于中国整个农耕时代。这是它与西医比较显示出来的独特之处,也是它所具有的极大优势。

在人类发展史上,只有农耕时代,人与人、人与自然、人的身和心的关系最为密切。试看,采集狩猎时代,人还不能自觉到自己和自然界的区分和关系,无需对所处的环境作细致的观察和思考。当然,这时的人们对自然的破坏也是很小的,大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高于人类对它的“利用”。游牧时代,逐水草而居,也不大关心更大范围的自然环境;加之游牧生活所接触的林木草莽、物种有限,和他人关系的密切程度有限;原始游牧所得的生活资料也仅能保证生存,很难有余暇或多余劳动力专门从事观察研究工作。惟有到了农耕时代,因为获取生活所需的一切都和自然环境,包括超过人们自身生活范围的自然状况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人们不得不长期地、仔细地、反复地观察研究大自然的一切;同时,人类第一次有了当即消费之外的剩余生活资料,可以用较多的时间和人力专门从事研究和思考人与人、人与自然、人自己的身和心的关系,也才比较全面地把握了客观和主观的规律。

中医,归根结蒂是建立在对人的自身(包括身与心及其关系)、人与自然认识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对人类生存的环境,包括对矿物、植物、昆虫、动物以及天时变化、地文山川细致深入认识基础上的。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意识到人和客观本为一体,人不过是大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发现人体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之相互对立、依存、转化,认识自然界和人体的风、寒、暑、湿、燥、火六气及其相互影响,“上医医未病,中医医欲病,下医医已病”之类的经验,无不是长时间对人和自然及其关系深入研究的结果,是基于“天人合一”总体认识的细化。这一切认识,离开了农耕生产的实践是不可能获得的。神农尝百草的传说,不过是对这一漫长过程起始阶段的描述而已。

工业化时代,在生产物质产品方面的效率的确无数倍于农耕时代,产品质量也有了极大提高;但是,却把人赶进了车间、办公室、地铁、飞机……城市越发达,人越远离了自然;人对自然的漠然和残忍,不但恶化了环境,人的身体也受到了惩罚;各种现代综合症莫名其妙地增多、变异。

反观西医,固然前此已有游牧时代的成果、中世纪的医疗实践,但是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医学,却是从中世纪之后开始出现和形成的。众所周知,西方文化(现在常用的称呼为“希伯来-昂格鲁-希腊罗马文化”或“盎格鲁-萨格逊-基督教文化”)是在游牧时代定型的,其中的科学技术则是建立在数学基础上的,源自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参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18页以次,《亚里士多德选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强化于笛卡尔;贯穿其中,起到灵魂作用的是西方现在所谓的“传统”观念,其中无不飘荡着游牧时代形成的宗教的幽魂:事物都如造物主和被造物那样,永远是二元对立的、线性发展的、有序的、可逆的、可计算的、可重复的,必须依靠“理性”进行精确分析、经受逻辑分析的检验并在实验室得以反复验证。工业化的逐步发展影响到医学界,也就把人体也视为机器,可分解,且越分解越细微,由此又出现“还原论”——待各个细部研究清楚后,就可以“还

原”出整体了。至于大自然,依据《圣经》的启示,那是 God 为了他的孩子们——亚当、夏娃及其子孙生存繁衍而创造,供人类享用的。God 把亚当、夏娃放到伊甸园享受除禁果之外的一切就是明显的隐喻。这样,现象和本质、人和环境、身和心、生和死、夫和妻等等,无不处于二元对立、不可调和的地位了。

2. 什么是科学? 科学家、哲学家已经给出了无数的定义;其实,从人类的生活生产经验看,能够有效地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就是科学。中医学关于人体和宇宙的整体论、六经学说、辨证论治、方剂学已经经历了千百年无数中国人生命的检验,现在还在现实中有效地为 13 亿中国人和韩国、越南等国家人民的健康做着贡献,这就是科学,尽管有些内容是在实验室里无法“验证”的,不可计算的。

对西方现在流行的观念、学说和方法论,自古就受到了其原产地另一批学者的质疑;自上个世纪中叶以来,这种质疑受到自然科学中狭义相对论、混沌理论等新成果的启发,加之反思西方一再出现的种种危机,包括由那里发动、殃及全人类的两次世界大战和而后的“冷战”、从未间断的“局部战争”、种族屠杀,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思潮,逐渐成为西方思想界的主流;质疑后来发展为批判和“解构”,进而出现了重新“建构”西方思想体系的探索。其中有不少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已经把头掉向东方古老的中国,发现数千年未尝中断的中华文化中蕴含着符合人类发展规律、可以让人类未来不致毁灭反而能获得幸福的理论学说,其中也包括了中医学(例如郝大维、安乐哲:《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中文版作者自序”,5 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年 9 月)。

3. 当今时代,足以和西方理念并驾齐驱,使二者在相互碰撞中取长补短,相容相足,改变一种思维模式独统世界的局面,把人类自身、人类和宇宙相对立的僵化观念从自我毁灭的前路中拯救出来的,到目前为止,只有中华文化一家。而在中华民族所有形态文化中,最能全面、集中体现中华文化核心理念,亦即中国哲学思想的,就是中医学。

中医学并不是现代学术分科中的纯自然科学,它是“跨学科”的,是哲学、心理学、环境科学、生理学、药理学等等学科的混合物(在这里我也不得不借用在西方已经遭到质疑的学科分类的名称)。中医学的浑然、模糊、起于经验(而非理性)、没有“预设”、缺乏“标准”(指方剂等)、解剖学难以验证(如经络)等等,在过去都是被西方指责为“不科学”的论据,现在在他们看来已经是“‘现代科学’无法解释”而又足以启发西方“传统思维”的命题了。从中华民族成员看来,中医学的整体、综合、辨证、动态,都是中华文化本质特征的具体、形象、生动的体现。

将近两千年来,多少人为保存、研究、实践、弘扬《伤寒论》以及其他中医学经典付出了多少心血,又有多少人蒙这些经典所蕴藏的博大精深思想之恩而闯过了“疾疫”和病痛之灾,保证了中华民族的繁衍、壮大!现在,以《伤寒论》等经典为代表的中医学,应该逐渐走向世界,让人类能够共同享受中医的美妙,进而推己及人,由人及物,让中医学所秉承的中华民族对人生、对环境、对万事万物的认识成为挽救地球、挽救未来的人类智慧。

4. 要让《伤寒论》等经典以及中医学的高明医术大规模地走出国门,并且扎根在那里,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关键在于西方的“传统思维”经过近三百年的浸润,已经成为大半

地球的统治思想,至今仍然是世上的强势理论。同时,我们的主观方面也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国内中医的西医化已经很严重了。对此,我们不要责怪任何人。当国破山河在的时候,很容易引起民族沉痛的反思和自责,加上先进生产力的炫耀,极易让落后者自惭形秽,以为自家的一切都是糟粕。民族自信心通常是要以物质财富为基础的。时至今日,我认为,首要的是中医学界要在中西对比中重新认识祖先所传下来的遗产之宝贵,以中医学之理念研究中医,摆脱以西医的思维解释中医学的现状。这就是为什么我多次呼吁中医药院校要让学生一进校门就要学习中国哲学。当西方的思想家在努力推翻“欧洲中心论”(或曰欧罗巴-美利坚中心论)的时候,我们岂可作壁上观?其次,要掌握“话语转换”的本领。所谓“话语转换”,其实就是用他人能够理解、愿意听取的方式方法和语言进行表达。为此,我们需要深入地研究西方文化包括西方医学理论,最好有大批中医界的人才能够做到知己知彼、入室操戈。再次,需要在对方同意的情况下派出大批高明的中医医师,掌握一门以上的外语,到各国去行医。任何事物,只有放到另外的环境中,与该环境固有的同类事物相比较,方能彻底显其优劣长短。

5. 在中医近代发展史上,有过两次几乎惨遭扼杀的风浪。一次是1912~1913年北洋政府制定《壬子癸丑学制》,取消中医教育内容,“企图实行自教育始以消灭中医的政策”;一次是1929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要实施《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李经纬:《中医史》,392—394页,海南出版社,2007年9月)。这是典型的匍匐在“欧洲中心论”神主牌下自断命根的愚蠢行为。经过这两次的折腾,中医虽未被“扫除”,但已迅速退居“二线”,即遁在民间,断绝了政府的一切支持,命悬一线了。对此,宰割中医者固然应得其咎,但其时中医自身思想保守、曲解五行、附会鬼神、邪说横道、庸医害人也起了自毁的作用。是新中国的建立为中医创造了与以往绝然不同的环境,但西学的侵蚀却并没有消除,近年反有愈甚之势。回顾百年前之痛,使我坚信,中医树立自信之后,急需继之以自强,即继续探索并完善从中医实际出发的研究与教学的路径和方法、吸收西医适用于我的一切方法和技术,最终形成中国新医学。那将是中华民族之幸,世界人民之幸。

《四库全书系列伤寒类医著集成》的编辑出版,就是中医界自信自强的写照,是中医不但正在振兴,而且必将成为世界医学界“显学”的好兆头。我既要祝贺该书的出版,更要预祝中医学灿烂的未来。

许嘉璐

2009年8月28日夜于日读一卷书屋

四库全书系列伤寒类医著集成序二

在中国学术文化的传承中,文献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医药文献的作用亦即如此。通过对文献的研究、对经典的阐释以关涉现实、以接续传统与未来,不仅是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发展的主要方式,也是中医药学发展的主要方式。中医药典籍卷帙浩瀚,目前已知的约有3万余种,可见到的有1万余种。这些古典医籍文献与信息资源,蕴藏着世界上独有的巨大的人类生命科学信息,有相当一部分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价值,被国际上称为“人类医药学的原始资料”。证明这些财富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文献。在中医没有正规教育机构之前,中医药知识的传播靠的就是对文献的学习和领悟。中医药文献,是中医学传承的载体,承载着中医学数千年的文明史、成就史,使之薪火相传、与时俱进。关于文献著录的工作,“本属历朝承平时代之常事”,但清代对《四库全书》的编纂是“政府方面文化事由应该特笔大书的一件事”。因为“这回和前代却有点不同,的确有他的特别意义和价值”。“这种事业从前只有私人撰述——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所有批评不过私人意见,《四库全书》这部书,却是以公的形式表现时代思潮,为向来著述未曾有。当时四库馆中所网络的学者三百多人,都是各门学问的专家”(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由政府出面组织,集专家集体智慧,就资料的可信性、著作的权威性而言,《四库全书》所汇集的清以前多学科的重要史料,在我国历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其中收录的大量医学类书籍,是认识中医学、研究中医学弥足珍贵的史料。

得知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组织编纂出版《四库全书系列伤寒类医著集成》的消息,心中激动不已。盛世兴文,能把这样一个庞大的工程从想法变为现实,的确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大动作。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对中医学传承工作的重大贡献。从选底本到找校本,从加标点 to 添校释,从补遗漏到纠讹误,从编目次到写校记,工程之巨之大、之繁之琐、之艰之辛、之苦之难是可想而知的,应当感谢他们的创造性劳动。

《伤寒杂病论》,是中医学形成、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是中医学的关键性支撑和主体构造之一,是张仲景对人类社会的最伟大贡献。以《伤寒杂病论》为核心的仲景学说,影响了中国医药学近两千年的发展、兴亡史。从某种意义上讲,不研究仲景学说、不承袭《伤寒杂病论》的学术思想,就很难说医论道。

自《伤寒杂病论》问世始,围绕张仲景学术思想的研究之风就日渐兴起,且呈愈来愈炽之势。在《隋书·经籍志》之前,《伤寒杂病论》是以“仲景方”的称谓出现的。现存文献中可以看到,除我国的《小品方》残卷外,国外的《朝鲜史》卷十中也有原汁原味的记述,日本国也可以找到相关内容的材料。后世看到的《伤寒杂病论》的前半部《伤寒论》,是经魏晋时的太医令王叔和整理、编次之作,其时当不足百年;《金匱要略》被发现得更晚,是大约

于成书 800 年之后,才被北宋翰林学士王洙在馆阁中发现的。后来,二书又经过宋代林亿的校正,而得以刊行和广泛传播。以《伤寒论》言,如果把王叔和的编次本称为“祖本”的话,一源三流,由它派生出的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子本”莫过于唐代孙思邈(习惯上称为《唐传本伤寒论》)、金代成无己(《注解伤寒论》)和明代赵开美(习惯上称《宋本伤寒论》)所整理、研究、注释、校勘的三个珍本了。后世研究《伤寒论》的专著虽多,但从脉络上看,均是从以上三个珍本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孙本”。根据中医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编辑出版的《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和笔者从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等专业图书馆及国家和首都图书馆检索到的内容,结合从其他途径搜集到的相关资料证实,目前在国内可以看到的《伤寒论》的各种版本多达 600 种,刊刻次数在 1000 次以上,其影响之大是不言而喻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 1700 多年间,共刊印过近 400 种,其中以清代出版的本子最多,总数超过 100 种。这些版本,有根据原著重新分类编次的,如方有执的《伤寒论条辨》(1592 年歙县方氏刻本),清代喻嘉言的《伤寒尚论篇编次仲景原文》(1648 年锡环堂刻本)、张志聪的《伤寒论纲目》(1673 年刻本),日本内藤希哲的《伤寒杂病论类编》(1819 年日本大岛燮即省庵刻本)、山田正珍的《伤寒论集成》(1879 年日本杏花园刻本)等;有根据原文逐条注释校勘的,如金代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元刻本,1955 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清代张锡驹的《伤寒论直解》(1712 年钱塘三余堂刻本)、陈修园的《伤寒论浅注》(1797 年三让堂刻本)。相比之下,《金匱要略》的本子少于《伤寒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共出版有 60 种上下。《伤寒论》与《金匱要略》合刻的本子(即《伤寒杂病论》)数量也不多,现在所能看到的不超过 100 种。

一个学说的构建,与其本身的影响和社会对它的承认和应用情况是分不开的。一般说来,从事研究的人数越多、应用的范围越广泛、涌现出的成果越非凡的,其学术成就也越高、社会影响越大,学说构建也越完整。仲景学说的构建,除了张仲景本人的聪明智慧和创造性劳动之外,与后人长期不懈地继承、发挥、完善、补充、研究、发展是分不开的。从真正意义上说,仲景学说是以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及其人文思想为核心的数代医家研究成果的汇集和经验结晶,是人类共同创造的社会财富。从金元时期成无己的《伤寒明理论》开始,对《伤寒杂病论》的研究性著作如雨后春笋一般,亮相于中国乃至世界医药学的大舞台上,代有鸿篇巨制,年有新鲜华章,成为祖国医学发展史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的 1000 多年间,出版的这类研究性著作已达 400 种左右。这些著作,在主题选择上,或紧密联系《伤寒杂病论》原文进行阐发,如明代王肯堂的《伤寒准绳》(1604 年刻本),清代张璐的《伤寒大成》(1666 年雋永堂刻本)、庆恕的《伤寒辨证》(1903 年刻本)等;或按仲景的本义进行演绎,如宋代庞安时的《伤寒总病论》(1823 年黄氏士礼居刻本)、宋代朱肱的《伤寒类证活人书》(1591 年刻本)、清代徐彬的《伤寒百十三方发明》(1667 年刻本)等;或是研究者自我经验的介绍,如明代王震的《王氏家宝伤寒证治明条备览》(1561 年双泉书斋刻本)、陈文治的《伤寒集验》(1633 年四川布政司刻本)等。在表现形式上,除以论述为主导的基本方式外,也有应用问答形式表述的,如清代舒位的《伤寒问答》(1870 年古冈刘氏藏修书屋刻本);以表格形式直观表述的,如元代吴恕的《伤寒图歌活人

指掌》(1600年闽乔山堂刻本),清代包诚的《伤寒审症表》(1871年湖北崇文书局刻本);以歌赋形式表述的,如宋代许叔微的《伤寒百证歌》(元刻本),宋代钱闻礼的《伤寒百问歌》(1309年刻本),清代吴谦的《伤寒心法要诀》(1742年尊经阁刻本)、陈元犀的《金匱方歌括》(1836年南雅堂刻本)等。可以肯定地说,这些著作对于增大仲景学说的外延、扩大仲景学说的影响和对仲景学说的传承、发扬是具有无可替代意义的。

面对如此庞大的著作群,人们要在自己有限的视野中去发现它、认识它,并想在有限的人生中去读完它,显然是不现实的,历史上的许多研究者都是带着这种珍本难寻、望书兴叹的遗憾而告别人世的;就是到了传播途径多样化、快捷化的今天,今人要想全部接触到这些秘笈也是非常困难的。《四库全书》的策划者们,以敏锐的思维、广阔的视野,博览群书,集万为一、化繁为简,从浩瀚如海的古医籍中挑选出若干种精品来供人们研读,实为中医学的广泛传播做了一件有创意的善事。《四库全书》著录书3457部,79070卷;存书目6766部,93556卷,编成后共缮写七本,颁储于各地:存于北京紫禁城的称“文渊阁本”(1949年1月6日迁入台湾,存台北故宫),存于北京圆明园的称“文源阁本”(清咸丰年间毁于英法联军),存于奉天(今沈阳)的称“文溯阁本”(后移存北京),存于热河(今承德)的称“文津阁本”(后移存北京),存于扬州的称“文汇阁本”(毁于洪杨之乱),存于镇江的称“文宗阁本”(毁于洪杨之乱),存于杭州的称“文澜阁本”(洪杨之乱半毁,后补抄,存浙江图书馆)。经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在对《四库全书》的全面整理中确定,该书收录的有关伤寒类专书共14种78卷、散在性伤寒类书籍共15种98卷,两者的总数量占《四库全书》中全部医学类书籍的四分之一强。这些著作,既尊古明礼,又包容大度,或为伤寒学说的开山之作,或为伤寒学说的立派之书,或为伤寒学说的扛鼎钜制,或为伤寒学说的稀世孤本,共同构建了伤寒学说研究中具有主体作用的代表性文库。《四库全书系列伤寒类医著集成》,以文渊阁本中的伤寒类书目为整理对象,同时参照文津阁、文溯阁本的相关内容,应该说是可靠的和稳妥的。《四库全书》所选的这类著作的取舍原则,与所能见到的有关伤寒学说的全部著作相比,虽然也有缺陷,如孙思邈的《千金翼方》未能收入,使人们不能窥见其中收入的《伤寒论》的原貌;成无己的《伤寒论注释》收入的是无图本,内容不如如有图本直观等,但也收入了一些《四库全书》成书前已经或濒于失传的散在性珍本,如《永乐大典》之《普济方》中有关伤寒学说研究的辑录本等,保存了明代之前有关伤寒学说研究的大批重要资料。白璧微瑕,千虑一失,从总体上评价,《四库全书》对书目的选择标准还是比较客观的,所选伤寒类书目的品味和分量基本上都是被医界认可的,对伤寒学说的传承功莫大矣!针对客观上存在的这些问题,负责此项工作的安徽中医学院的王旭光教授和江苏科技出版社的编辑们,想方设法进行弥补,把其他本子中的《注解伤寒论》的画图和《四库全书》本中未收入的序言、凡例等找来补入,作为各构成本的附录,较好地解决了历史造成的这一遗憾。

《四库全书系列伤寒类医著集成》,一套三部,不仅把《四库全书》中有关伤寒类的书目进行了全面、系统、认真的梳理,集成《四库全书伤寒类医著集成》,而且把《四库全书》存目中的14种伤寒类医著和《续修四库全书》中的26种伤寒类医著进行了挖掘、整理,集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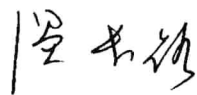
《四库全书存目伤寒类医著集成》和《续修四库全书伤寒类医著集成》，作为对《四库全书》中相关书目的补充和扩展，既比较全面地再现了清之前《伤寒杂病论》的研究、传承的全貌，又为今人的学习提供了一部更集中、更明快的范本，使伤寒学说的发扬光大、传播普及又上了层楼，功莫大矣！

与西方的哲学不同的是，中国文化不是在否定中前进的，它的连续性和渐变性特点决定了它以继承为主旨的道路。中医文献学的研究方向，从本质上应该定位为继承的。通过经典的阐释以表达思想，温故知新，是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一个主要方式。如果把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的话作为阐释继承与创新相辅相成的关系的准则，很显然，“信而好古”，就是处理好二者关系的前提。“好古”的实质，不是对古之实存性上的仰慕，而是出于对古今一道的领悟和文化生命连续性的契合。要相信历史、相信古人、相信古籍，因此要下大力气把古代遗留下来的财富挖掘好、研究好、继承好。对于古籍的态度，章学诚“临文必敬，论古必恕”（《文史通义》）的话值得借鉴。

历史文化，总是因时而进、日新月化的，故每一时代必有其“作”。“述而不作”，是“信而好古”基础上的行为，属于孔子的谦辞或语言上的另一种表述方法。实际上，孔子是“述而又作”或“又述又作”的。他不仅强调了“作”的严肃性，而且是把“作”视为创新看待的。孔子的“述、作”精神，实质是提倡古今的贯通，所体现的就是质与文、自然与文明的连续。亦即司马迁追求的“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标（《汉书·司马迁传·报任少卿书》）。中医文献同样存在着如何创新的问题，关键是如何解决好与继承的关系。创新的方式，可分为挖掘创新（在整理中创新）、改良创新（在继承中创新）、原始创新（在发展中创新）等多种，原始创新固然代表着创新的方向，但是非常不容易成功的，或许这正是影响中医学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按照中医文献学研究的特点，挖掘创新和改良创新应作为主要的方式，换句话说，继承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创新；同时，要在尊重中医学自身规律的基础上有的放矢地探索原始创新的问题，推出新的理念、新的方法、新的手段、新的技巧，以适应和满足社会发展和人民健康事业不断增高的需求。“继承而不泥古，创新而不离宗”，应该是中医文献研究工作的基本立足点。《四库全书系列伤寒类医著集成》，正是在这条方针的指导下集古传今、亦述亦作、古为今用的。

文化是属于社会的，中医也是属于社会的。在中国，要向全民普及文化教育，同样需要普及中医教育。当前这种广褒、和谐、包容、开放的文化氛围，也同样给中医药文化的复兴带来了良好的机遇，给中医文献研究工作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只要我们去努力、去奋发，就一定会大有可为的。

《四库全书系列伤寒类医著集成》付梓之际，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邀我作序。写上这些话，以为祝贺。



于中华中医药学会